

WTO YU ZHONG

香港乐施会资助

WTO 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

—— 来自中国杨凌农科城的系列研讨报告

赵惠燕 李东鸿 王秀娟 主编

NONGCUN
MIN

西安地图出版社

后
继



香港乐施会资助

WTO 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

——来自中国杨凌农科城的系列研讨报告

主 编：赵惠燕 李东鸿 王秀娟

副主编：刘慧娥 尚桂蓉 赵惠聘

编 者：李鹏辉 闫德忠 胡想顺

胡祖庆 詹义清 王学慧

张宇红 祝传书 金 奎

西安地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WTO 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 / 赵惠燕, 李东鸿主编.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2. 10

ISBN 7-80670-335-7

I. W... II. ①赵...②李... III. ①农业经济—中国—文集②农村经济—中国—文集③农民—问题—中国—文集 IV. F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4792 号

**WTO 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
——来自中国杨凌农科城的系列研讨报告**

主编 赵惠燕 李东鸿 王秀娟

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友谊东路 334 号 邮政编码 710054)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 毫米×1092 毫米·1/16 11.0 印张 240 千字 (插图 2 页)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80670-335-7 / S · 18

定价: 15.00 元



郭书田研究员在作报告



谢阳研究员在作报告



研讨会一角



研讨会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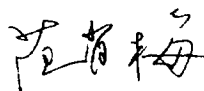
序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农业来说，有利有弊，“弊”是现实的，来得快；“利”是潜在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如何抓住机遇，减少冲击，趋利避害，不仅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面临的当务之急，也是广大科研人员研究的重大课题。陕西省农村妇女科技服务中心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GAD（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所的农业专家，通过香港乐施会的资助，在杨凌举办了 WTO 与我国农业系列研讨会，就入世对陕西乃至我国农业的影响，进行了全面而富有成效的探讨。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这是由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粮食须臾不可或缺，农业基础地位实乃重中之重。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面临新的问题，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农业发展由受单一的资源约束转为受资源、市场和环境的多重约束，农产品难以满足优质化、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农业与整个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日益增强，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使农产品卖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困难往往与希望并存，挑战同时催生着机遇，只要我们合理利用 WTO 规则，充分挖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农业资源，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合理配置资金、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提高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将充满希望。

陕西是一个内陆农业省份，发展农业有着多方面的比较优势。杨凌是国家惟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有着不可多得的农业科技资源。参加研讨会的农业专家们，在我国农业进入新阶段和我国入世新形势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问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同样，将这些真知灼见汇辑成书，也是一项具有使命意义的工作。

很高兴为此书作序。



2002 年 7 月

前 言

经过 15 年的奋斗，中国终于迈进了世界贸易组织，终于融入了贸易全球化的潮流中。作为农业研究人员、农业管理人员、农业推广人员，我们倍感压力重重。

我国的改革最早从农村起步，当时的家庭联产承包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为整个社会改革奠定了基础。但目前“三农”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农民增产不增收，导致国内需求乏力，农村经济负债严重，干群关系恶化，贫困地区的农民脱贫又返贫，农业产业化滞后，效益低下。尤其是，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未能有效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农产品的市场配置受到重重阻碍，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农村两性的差距更加拉大，妇女弱势群体更为贫困。“三农”问题不解决，将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稳定的要素。我国加入 WTO 后，这些问题更为复杂和紧迫。

入世后，不说农民，就我们广大农业科教研究人员、农业管理人员、农业推广人员思想上准备不足，大多数都对 WTO 不清，对农业规则不明，对入世茫然不知所措。在这种背景下，陕西省农村妇女科技服务中心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GAD (Gender And Development) 研究所决定，从 2001 年 12 月开始，召开“中国加入世贸对农业的机遇与挑战”系列研讨会，以期推动新形势下农村改革的深入，并结合陕西省的实际，结合杨凌区的实际，结合农村妇女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供决策参考的政策建议。我们首先在杨凌——全国惟一的高新农业产业示范区举行以政协委员为主体的研讨会，然后相继召开杨凌区高层管理人员（包括省级农业管理人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教授、研究人员、研究生等研讨会，会后又进行了专题研讨。系列研讨会得到了长期致力于中国农业发展事业的香港乐施会的全力资助。

研讨会得到了杨凌示范区、杨凌区政府、政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示范区和杨凌区政府的领导、各级主管农业的干部、全体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各学院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研讨会的主要特点是：（1）出席研讨会的专家规格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扬博士作了“WTO 与中国农村发展”的讲演；国务院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研究员就“打到敌人后方去——入世后农产品的销售策略”作了既是一场有关 WTO 精彩的讲演，又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报告，更是一场真诚做人原则的恳谈；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博士生导师朱希刚研究员作了一场实实在在、切实可行的报告。（2）参加研讨的学者阵容强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王征兵副教授就陕西省农产品

对外贸易现状与对策进行了分析,对学生来说既是一堂专业教育课,也是一场毕业教育课:刘惠娥副研究员就杨陵区应对 WTO 提出了创新举措:杨陵区副区长程建国、政协主席朱林章、政协办公室主任李鹏辉就“应对 WTO,发挥资源优势,发展陕西中药产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杨陵区政协常委陈波就杨陵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应与 WTO 对接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议:杨陵区政协常委马宽绪做了“应对 WTO、挖掘历史文化、开发旅游资源、构建杨陵经济发展新平台”的讲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闫德忠等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应对 WTO 进行了探讨:陕西省农村妇女科技服务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赵惠燕等从社会性别角度就贸易全球化对社会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影响进行了探讨。(3)部分研究生、本科生也参加了研讨与发言,他们的思路敏捷,语言犀利,直指主题。(4)研讨的主题涵盖面宽,内容涉及我国农业发展的方方面面 研讨会的气氛活跃,效果显著。

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分析 WTO 对我国农业的影响,提出可行的措施,正是我们举办这次研讨会的目的。

编者

2002 年 5 月

目 录

21 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	郭书田 (1)
加入 WTO 与我国农村发展·····	谢扬 (23)
加入 WTO 后我国农业的应对·····	朱希刚 (31)
发展绿色产业的几个问题·····	郭书田 (43)
WTO 相遇中国社会性别与农业发展·····	赵惠燕 李东鸿 王学慧等 (51)
加入 WTO 对陕西女性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刘慧娥 赵惠燕 李东鸿等 (54)
试论我国农业产业化理论框架与政策结构·····	霍学喜 董银果 (58)
加入 WTO 对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闫德忠 张会玲 孙楠 (67)
我国农民国民待遇问题浅析·····	王鹏翔 郑少锋 (72)
入世后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思路·····	陆迁 (76)
应对 WTO 适时调整陕西农村产业结构·····	刘慧娥 曹瑾 (81)
加入 WTO 对陕西农业的影响及对策·····	王征兵 (86)
WTO 与陕西农业发展对策初探·····	李侠 韩联社 (91)
应对 WTO, 发挥资源优势, 发展陕西中药产业·····	程建国 朱林章 李鹏辉 (94)
社会性别与贸易全球化·····	赵惠燕 李东鸿 王秀娟等 (99)
WTO 与杨凌示范区经济管理体制创新·····	刘慧娥 李侠 (103)
在杨凌建立生态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设想·····	杜晓燕 (109)
杨凌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与 WTO 对接的几点建议·····	陈波 (112)
应对 WTO 挖掘历史文化 开发旅游资源 构建杨凌经济发展新平台·····	马宽绪 (115)
提高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 迎接入世人才竞争·····	吴清华 (120)
WTO 与陕西苹果的产业化发展·····	李东鸿 赵惠燕 赵惠聘等 (123)
WTO 农业规则与中国支农方式调整·····	王秀娟 (127)
加入 WTO 与地区经济发展·····	崔彩嫻 闫德忠 王秀娟 (130)
WTO 利剑砍向地方保护	
——论加入 WTO 对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影响·····	孙月 (133)
乡镇企业与 WTO·····	郭书田 (135)

农村经济与农税改革·····	郭书田 (139)
推动我国农业“走出去”及农业外交的战略思考·····	郭书田 刘劲松 (142)
WTO 与耕地动态平衡·····	陆迁 王秀娟 (148)
提高农民素质 增加农村收入 迎接入世挑战·····	王秀娟 赵惠燕 李东鸿等 (153)
实行土地私有化 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赵伟鹏 (155)
发展农村合作组织 应对 WTO 的挑战·····	陈祥云 (158)
应对入世挑战 调整苹果产业结构	
——十里塬果农协会成立与运作的调查报告·····	李东鸿 赵惠燕 尚桂蓉等 (161)
面对入世 中国农民如何做·····	马国栋 (163)
加入 WTO 对西部农业的影响和对策·····	郝婷 徐军宏 张勋江 (165)

21 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 郭书田

在讲 21 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问题之前，先讲一点中国的农业与农村的现状是个什么样子。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农业大国，有 12.5 亿人口，农村有 9 亿人，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除中国外，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国家。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有这么四句话：没有农村的社会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社会稳定；没有农村的社会进步，也就没有全国的社会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也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这四句话很符合中国的实际。农业问题是关系我国全局性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始终是我们国家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正因为这样，中国农民的问题、中国农业的问题、中国农村的问题，始终是国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等几个阶段，农业虽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当中也走过弯路，犯过错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这个序幕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的改革推动了城市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 20 年改革开放与发展，概括地说，中国的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或者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基本能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综合生产能力以粮食来讲，大体达到 5 亿吨，也就是 1 万亿斤左右，1998 年为 4.9 亿吨以上，也就是 9800 亿斤以上。光看总产量还不够，还要看人均的占有量。人均的占有量大体达到 400 公斤的水平。现在农业的生产力大体就是这个水平。人均 400 公斤是什么概念呢？同国外比较一下，德国人均 400 公斤，基本满足国内的需求，它的机械化很发达，欧盟以它为首，它仅次于美国。

美国有一个学者，叫作莱斯特·布朗，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人，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所长，他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叫作“21 世纪谁能养得起中国”，后来引起全世界强烈的反响，由此导致出了一个“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开始是从粮食说起的。其根据来源于这位学者。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到 21 世纪 30 年代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将到 16 亿人，中国的土地不断地减少，水资源极度短缺，科学技术也比较落后，到那个时候中国的粮食产量将比现在下降 20%，以致粮食缺口将达到 3.7 亿吨，全世界的贸易粮只有 2 亿吨。全世界能够出口的粮食全部都给中国还不够，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提出“谁能养得起中国？”按他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谁也养不起中国。

经过我们反复研究，认为他这个观点不能成立。

到 2030 年，我国人口最高峰为 16 亿人，是国内人口学家比较认可的一个数字，2030 年以后人口开始下降。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与西方人不完全一样，按东方人的膳食结构计算，到 2030 年大体上仍然维持人均 400 公斤的消费水平。人均 400 公斤，16 亿人口，总需求量为 6.4 亿吨。现在是 5 亿吨左右，缺 1.4 亿吨。在现在基础上，增加 1.4 亿吨，主要

靠科学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实现 6.4 亿吨总产量目标。这是农业科学界比较一致认可的一个预测。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就是用 16 亿亩的粮食播种面积，每亩播种面积的产量达到 400 公斤，就可以实现。一个是播种面积，一个是每亩的产量。两个 16 亿，两个 400，需求量为 16 亿人口乘人均 400 公斤；供给量为 16 亿亩的播种面积乘每亩 400 公斤的产量，就可以实现。现在看来是问题不大。16 亿亩的播种，低于近两年实际的播种面积，近两年的实际播种面积是 17 亿亩。多出来 1 亿亩。农业部有一个安全线，即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不能低于 16.5 亿亩。如果低于 16.5 亿亩，可能出现粮食严重短缺，出现粮食供给的紧张。这两年 17 亿亩，大家的感受是粮食多了，农民卖不出去，市场粮价很低，粮食部门也不愿意收购，国家粮库堆放的粮食多了，财政负担也很重等。这一系列的矛盾是粮食多余的矛盾，而不是短缺的矛盾。所以说播种面积问题不是很大，当然还要严格控制耕地减少。

最近国家土地局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每年的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做到了总量的动态平衡，这很不容易。过去若干年，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耕地大量减少，通过复垦和新开垦的土地来补偿减少的耕地，还不能平衡，而是“赤字”，每年净减少 300 万亩左右，而且都是好地。1998 年第一次实现了总量动态平衡，解决了耕地减少的“赤字”问题，净增加了 100 万亩，占的地，加上补偿的地之后，多余出来 100 万亩，这是首次。既然有了首次，以后经过努力，可以实现总量动态平衡，而且还能平衡有余，这样就可以保证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 16.5 亿亩，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新加坡的李光耀在上海参加《财富》五百强论坛，提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耕地减少，他很关注这个问题。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就要占地。修高速公路、修铁路、修机场，就必然占地。占地还要靠新开垦和复垦的土地去补偿。实行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占地收入的耕地占用税，专门拿来复垦和新开垦耕地，补偿被占的耕地。真正实现总量动态平衡。这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 16 亿亩的播种面积上实现亩产 400 公斤的产量。现在亩产量是多少呢？大体上是 300 公斤左右，1997 年为 292 公斤，还要提高 100 公斤左右，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靠科学技术。首先要靠良种，还要靠耕作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灌溉技术等等，综合配套。这里还要说一个信息，现在计算耕地面积是统计面积，是 14.3 亿亩，我刚才讲粮食面积 17 亿亩是加了复种指数，包括一年两季、三季，目前的复种指数为 156%，整个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是 23 亿亩。

这是统计面积。实际的耕地面积是多少呢？近 20 亿亩，相差 42%。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是美国的卫星照片；第二个是中国科学院的遥感测量；第三个主要是国家土地部门十几年的实地勘测。这三个来源数字，大体接近 20 亿亩。这个数字中央准备适当的时候公布（注：新华社 1999 年 11 月 3 日公布，全国耕地面积为 19.5 亿亩）。公布以后会带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过去计算的亩产量没那么多了，因为亩产量是按 14.3 亿亩计算的，如果接近 20 亿亩的面积计算，亩产量就下跌了，反过来讲，亩产量没有那么多，现有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的潜力非常大。

以上是拿粮食作代表。分析现在中国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体就是这样一个概念，5 亿吨的粮食生产能力，到 2030 年，实现 16 亿亩播种面积，亩产量 400 公斤，总产量 6.4 亿吨；16 亿人口，人均 400 公斤的目标是可能的，当然要经过努力。

第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或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是中国的农产品供给和需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这句话，供给和需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又是个很重要的标志。有的学者讲结束了短缺经济的时代，过去实行的长达30年之久的计划经济，而这个计划经济很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供给短缺，不得不采取配给制的办法，也叫做“票证经济”。1999年国庆50周年的时候，回顾历史，很多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是过来人，发票的历史都亲身经历过。粮票面值小到什么程度？半两。拿着半两粮票去买一点饼干，买一点面包。最近发现上海还有半两的1/2的粮票，就是二钱五。记者采访收藏者，当作很珍贵的东西珍藏，全国没有，全世界也没有。现在要买这张二钱五的粮票恐怕要很高的价钱。记者问他，你这个二钱五的粮票用过没有？还是当作珍藏品珍藏起来？他说，不，我用过。二钱五的粮票能买什么？买一块饼干。

这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历史，短缺经济的历史，为了满足人民的最低需求，设计得很细，也很有意思。这个时代可以说结束了。今后还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我们常议论这个问题，一些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不会吧。但也不能把话说绝了，万一出现连续几年的灾荒，会不会重新又实行配给制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才有了这个判断，短缺经济的时代过去了。

短缺经济这个词是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的，他专门写的一本书《短缺经济学》，上下册，就讲短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等于短缺经济，或者准确一点讲，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等于短缺经济。在中国，连续30年之久，现在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或者说得准确一点，我们结束统购派购历史是1985年，不是1979年，也就是35年这样的历史。

还有一些学者说中国已由卖方转入买方市场，也就是供给大于需求，出现了买方市场。现在市场上农产品琳琅满目，东西实在很丰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价钱很低。昨天是星期天，我到自由市场看了看，东西实在很便宜，猕猴桃10元钱6斤。猕猴桃是维生素王，新西兰的猕猴桃是从中国引进“中华猕猴桃”以后改良的，行销全球。现在大商场摆的猕猴桃贴的标签是新西兰，仔细一看，实际上也不是新西兰的，是国内生产的。陕西、河南等地大面积种植猕猴桃，口味很好，色泽也很好，就是外观粗糙了，形状大小不大一致。打着新西兰标签，在市场上销售的猕猴桃，是16元1斤，悬殊太大了。80年代中期，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新西兰带回一盒两个猕猴桃，交给我们研究，说这是从中国引进新西兰的，现在他们发展起来赚大钱，我们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恢复我们传统产品的市场？他当时告诉说这一个塑料盒子两个猕猴桃，多少价格呢？1元美金，按现在的汇率计算，8元多人民币，一个就4元多人民币。中国的东西实在很便宜，外国人到中国市场一看都很惊讶，便宜得惊讶。但话说回来，这样便宜，对农民来说不见得很好。中国有句古话：谷贱伤农。果贱也要伤农。1998年陕西出的苹果，两毛钱1斤没人要，后来农民就索性不要了，谁去果园采收都可以，这还不是个别的现象，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里也有产品质量问题，优质产品的销路和价格是比较好的。由于这样一些现象，可以说短缺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供求大体平衡、丰年有余，是农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但是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这样一个供大于求的局面，带有结构性和阶段性的特征。这是因为总体上来讲，中国农产品的消费水平还是不高的，特别是农村。经济学上有一个恩

格尔系数，就是居民食品的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重，城市是 50% 以下，农村还在 50% 以上。农村消费的农产品，即直接消费的这一部分，也就是口粮也在下降，但是下降的数量与城市相比要低得多。1998 年，城市直接消费的口粮，降到人均 88 公斤，平均一天不到半斤粮。在城市里，吃饭的习惯，还离不开粮食。再低也低不到哪里去。要细分一下的话，早餐一两，午餐二两，晚餐二两，这是就最低消费，是不是还能降一点呢？可能降一点，但降不了多少，我看已经到底了。中国人有个习惯，山珍海味吃完以后，还要吃点大米饭，吃点面条，吃点馒头，还是要吃点主食，不吃点粮食不舒服，过去高达 150 公斤，从 150 公斤下降到 88 公斤，下降幅度是很大的。农村人口直接消费的口粮也在下降，1998 年是 249 公斤，最高的时候达到 260 公斤，从 260 公斤下降到 249 公斤，幅度不算大，但它的绝对量比城市还要高好多。粗细粮的比例有很大变化，细粮的比重由 45% 上升为 84%。大家想一想，如果农村消费水平，吃的口粮也降到了城市的水平，不要说人均 88 公斤，就算 100 公斤，那么他们所需求的由粮食转化成的动物食品那个数量，有多大！说中国最大的市场在农村，开拓中国市场潜力在农村，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城市吃的肉、蛋、奶的水平，比农村肉蛋奶的消费水平都高一倍到两倍以上。话又说回来，农村这么低，是不是农民不愿意吃？农民也懂得，肉、蛋、奶好吃，营养也好，但是，限于他的购买力，限于他的收入，特别是货币收入，他们现在达不到这个要求，农村结存一点钱，首先要解决盖房子的问题，还要解决子女教育的问题，也还要解决养老和医疗的问题，这属于社会保障范畴里的事。农村与城市不一样，农村方面的量太大了，都靠农民自己解决。在城市里，下岗职工，国家很重视，实行分流，再就业工程，最低生活费保障。而农村呢？这些国家没有管，都是要靠农民自己解决。农村也有下岗问题，乡镇企业不景气，关停并转的，还要下岗，下岗到哪里呢？下岗到家里，依靠承包的几亩地养活自己，土地成为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就是这种状态。这是一个判断，农产品供求平衡，而且是结构性的、阶段性的“供大于求”。

第三，由于新阶段的标志是现在生产的农产品，基本上是初级产品，就是原料，经过粗加工和精加工以后，变成工业化产品数量还很少。从全国来讲，我们农产品的加工率，综合来算 30% 左右，发达国家为 80% 以上；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率我国为 80%，而发达国家一般为 1:1 以上，有的达到 300% 到 400%。即按产值来算，1 万元钱的农业产值，加工后可达到 3 万~4 万元。而我国生产的农产品，上超市货架的产品很少，这也是我们农业相当落后的表现。现在要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由以上生产原料为主的初级产品，进入到经过粗加工精加工生产最终产品的阶段。

第四，新阶段的标志就是我国农业的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的经营、传统型的经营，进入到集约型的经营、现代型的经营。实现这个转变，主要是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科技贡献率。我们现在农业的科技贡献率，综合来算是 42%，要求 2000 年达到 50%，还要增加 8 个百分点，这也不容易。21 世纪要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有些领域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发达国家农产品的科技贡献率是 80% 以上，我们是 42%，距离很大，所以要通过实行科教兴农，从粗放型的经营转到集约型的经营，从传统型的经营转到现代型的经营，这也是一个大的转折。

第五，农业的持续发展要从消耗资源和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掠夺式经营转入保护和

合理利用资源改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阶段。我们过去农业资源是不定价的，土地是最珍贵的资源，浪费也很大；水也是最珍贵的资源，浪费也很大。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资源无价。在农产品成本里，土地不计价，不算成本，现在要算了。长时间以来，生态环境恶化，抗灾能力下降，使农业处于基础薄弱、后劲不足状态。现在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退耕还林还草，退田还湖，科学有效地利用资源，发掘资源的潜力，把资源和环境保护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推行生态农业，既要使经济高速增长，又能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把它统一起来，很有成效，不再走过去的传统老路。传统老路是什么呢？以过度地消耗资源为代价，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得到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老路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第六，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过去我们农业主要面对国内市场，而且主要是面对城市市场，因为农村的很大一部分是自给性的。现在粮食总产量 5 亿吨左右，其中 2/3 是留在农村的，商品粮只有 1/3。留在农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属自用粮，叫“三留粮”。农产品的综合的商品率为 70%，30%是自给性。今后进入新阶段，有个市场的转变，就是从国内市场转变为走向国际市场。特别是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又面临新的形势，即与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问题。

下面讲 21 世纪中国的农业和农村，也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问题，这也是今天要讲的重点。

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不能孤立地来研究，不能就农业研究农业，就农村研究农村，就农民研究农民。要从国家的整体并联系全球的发展趋势来考虑。总结新中国建立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的历史经验，要实现刚才说的六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要实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目标，讲起来内容很多，现实一点说，简要一点说，就是一二三四五。下面还有一句话，上山打老虎。我现在就讲这个问题，一二三四五是怎么回事呢？

一、一个基本的理论

这个基本理论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邓小平同志最伟大的贡献之一，给我们中国定位，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位置上。这是具有非常深刻意义的。我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大家学过《哥达纲领批判》这本著名的著作，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第二层意思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绕口一点。初级阶段的理论已写入党的十五大决议和修改的宪法中，特别指出，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了“长期”两个字，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

毛主席功劳很大，晚年犯了一些错误，我看最大的错误是老人家太急了。想依靠强大的政权，来加速我们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特别是在 1958 年，在农村亲自领导指挥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的名称也是毛主席确定的。当时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

叫农场，五花八门，毛主席听了之后认为还是人民公社好。当时流传一句十分振奋人心的话：“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就是我们实现共产主义要找个梯子，这个梯子中国找到了，这个梯子是人民公社。所以毛主席很兴奋，本来提了个口号，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7年赶超英国，15年赶超美国，叫做赶英超美。本来话里头还有“1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他还嫌不够，就把更长一点时间改成为“15年或更短一点时间”，超英赶美。并把赶超英国的时间缩减为二三年。他太急了，从而不断地反右倾保守。在这个时期毛主席花很多时间研究人民公社。我看研究农村问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有一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巨著，他对每一篇文章亲自逐字逐句阅读，亲自修改，最后加了按语出版的，深刻反映了“人民公社”、“大跃进”、“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思想，而且他逻辑性非常强地勾画出了如何过渡的过程。讲了经过三个过渡，最后达到消灭三个差别的目的。三个过渡，怎么过渡呢？第一个过渡，在人民公社内部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小队为基础，还有大队，还有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然后，由小队为基础过渡到大队，由大队过渡到公社。第二个过渡，由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还有第三个过渡，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通过这三个过渡来实现共产主义。

北京市1958年建了十个大的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那是做样板的，当时还宣布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最终目标，就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由按劳分配变成按需分配，由各尽所能变成各取所需，消灭三大差别，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勾画得非常美好。

我们是经历过来的，听到这些的确欢欣鼓舞，认为中国很快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啦，而且说共产主义不是渺茫的未来，很快就在眼前。当时就是这种心情。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当时我在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大学的老师、同学全部下放农村，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也下去了。

我去河南第一人民公社诞生的地方，遂平县的嵯峨山公社，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在那里蹲点，研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大形势是一天等于20年。我一看有点凉，住的是上房，没有床，铺垫麦秸，吃的是豆腐渣的窝头，一人一顿给一个，没有菜，有一个汤，汤是开水煮红薯叶子，加点盐巴。我想，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就是这个水平？豆腐渣很难咽下去，还要劳动。我有点怀疑，但对迈向共产主义的方向很坚定。

这个公社是最先放“卫星”的地方，把科学家都弄糊涂了，这边一个“卫星”，那边又一个“卫星”，放得越来越大。第一个卫星就是陈伯达蹲点的地方，有一个支部书记是个“劳动模范”，创造了小麦亩产量3200斤的记录。后来小麦卫星放到亩产8000斤，一亩地8000斤，也就是一亩地4吨。农大有很多专家、教授有点怀疑。农学系的系主任蔡旭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小麦育种专家，他培育出很多高产的品质，如农大183号等，推广面积很大。他不相信能亩产3200斤，科学家怀疑劳动模范的产量，这是个问题呀。不相信就是怀疑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因而不相信也不敢说。一位学植物病理的讲师是系里的总支部书记，他到晚上去收麦子的地里看，没翻地，麦茬还在，正好有月亮，他又拿手电筒去数麦子的分蘖，数有几个有效植株，然后一个分蘖有多少个小穗，每一小穗有多少麦粒，一算就算出总的有多少粒，然后算了千粒重是多少，最后产量就出来了，算出来以后，与3200斤差

距太大，只有 400 斤。说实在的，1958 年在河南这个地方，小麦 400 斤产量就算不错了。

陈伯达这个“理论家”就要求蔡旭教授同这个劳模竞赛，你教授的产量不能低于劳模，就这个原则。康生就曾经给农业院校的教授提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用产量计算的，教授是多少，副教授是多少，讲师多少，助教多少。康生说，亩产 1000 斤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 斤当四级，3000 斤当三级，4000 斤当二级，5000 斤当一级。陈伯达要求蔡旭教授同劳模竞赛，你的产量不能低于他，你低于他怎么能当教授呢？教授产量比不上一个农民的产量，怎么能教书呢？给他施加压力。这个教授非常苦恼，几天几夜没睡觉，最后表示说，我认输吧，我争不过他，我无法跟他争。但不争不行，你是教授必须跟他争，要不然你教授当不成了。没办法，领导做工作，后来想来想去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吧，比赛吧，当然产量要比他高，高多少呢？高 1 两，即 3200 斤零 1 两，就这样才算过了关。

这个事例是很深刻的，我讲这个例子大家觉得很好笑，但这是历史，是真实的，我们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再出现这种事，特别是愚蠢的事。毛主席想把中国建设好，尽快地富强起来，心是多么好啊，而且他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他在农民身上花的精力是最大的，操劳了一辈子。我刚才说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超过他的。但是，光有好心不行，太急也不行。当时自己又很自信，又听不进不同意见。最后发展到了吃饭不要钱，办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饱，等等。一些地方出现缺粮和发生浮肿病，维持不下去了。但有几个省委书记还不信，认为共产主义是方向，不能动摇，公共食堂不能解散。毛主席总觉得有点问题，派自己的警卫员回家乡去看，回来以后向他汇报，村子里公共食堂怎么样？警卫员讲实话，不行啊，吃不饱呀，挨饿呀。毛主席这才下决心说赶快解散公共食堂。这个“共产主义”不要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不要了。当时把吃饭不要钱说成是供给制，而供给制就是按需分配的萌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

我讲这些历史，有深刻的意义，不能急，不能脱离生产力的水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任何时候不能违背，违背了就要犯错误。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判断中国国情最科学的标志，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样来判断中国的国情，就会使我们头脑清醒。这个基本理论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是制订路线、方针和政策最基本的依据，离开这个基本理论就会犯错误，就会欲速则不达，最后还得倒回来。

二、两大市场主体

这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

在 5 万个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形成了两个大的市场主体。

第一个大市场主体就是农户经济，即家庭承包经营，或家庭经营。这个主体有多少呢？全国共 2.2 亿户，这是个独立的市场主体。现在中央的政策很清楚，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新的提法，我们感到欣慰。

第一，过去的提法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共 13 个字，现在改成 6 个字：家庭承包经营，把“为主”去掉了，把“联产”去掉了。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大包干”，也就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直来直去不拐弯。这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发明。这个说法非常科学，“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

这三句话不是大学教授说出来的，是小岗村的农民自己说出来的。中国的农民，知识文化程度很低而思维文化是很高的。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第一位，交足国家的，皇粮国税我不欠；留够集体的，也就是“三提”（村的三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和“五统”（乡的五项统筹费：民兵训练、计划生育、民办教师、修道路、优抚）是交集体的，农民承认这部分负担也留够；其余都是自己的，你就别再伸手了。马克思讲的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在作了必要的扣除之后其剩余应该留给劳动者，不能再伸手跟劳动者要了。这对过去人民公社制度是个革命性的措施。当然要实行这项制度变革和创新，当时冒了很大风险，有18户农民秘密开会，按了18个手印，对外讲，还是原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对内讲，就是大包干，交足国家，留够集体，其余都是自己的。而且还有诸如一旦遭到非议准备坐牢，如果18户农民坐牢，这18户农民的子子孙女，由全村的村民抚养。这张契约现在变成天安门前历史博物馆的重要的文物，珍藏起来，是无价之宝。就这么个创举，引发和推动了农村的改革，现在已经20多年了。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小岗村时，说了两句话：你们当时是冒了风险的；第二句话：这项制度30年以后也不能变。

第二，是把这个政策作为农村政策的基石，基石是不可动摇的。它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原则。

第三，是要给农民三个权，这特别重要，一是土地承包权，二是生产自主权，三是收益分配权。有了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使农民在经济上能当家作主，特别是收益分配权，在扣除成本，依法缴纳税费以外，都是我自己的，任何人不能再向农民索取，否则就是侵权。因此要依法保护这三个权。

第四，是这种经营形式不仅适合传统农业，也适合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现代化，还不能离开家庭经营制，数量可以减少，规模可以扩大，但不能改变家庭承包经营这个制度。这是由农业的特点决定的。它与工业不一样。农业是生物性产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不一致，最适合与家庭经营，世界各国都如此。我在澳大利亚看到一个农场，一家三个劳动力，经营6000亩土地，一个劳动力平均2000亩土地，三个劳动力是三代人，都是农学院毕业的，回家当农民，而且是自耕农，一个工都不雇，包括短工都不雇，全部是大型农业机械。这里有个问题，说农业是弱质产业，看你怎么来经营它，像这样的农业就不是弱质，而是强质，它的劳动生产率很高，超过当地的工业劳动生产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建立新的农业产业大军，农业工业化，就是用工业的装备来经营农业，达到很高的水平，最终消灭工农差别，而经营形式还是以家庭为单元。“家庭承包经营”这一个市场主体，全国共有2.2亿户，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大的市场主体。

第二市场主体是乡镇企业，也就是“异军突起”，农村的非农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个主体全国共有2200万个。简单的可以记两个“2.2”，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农户经济是2.2亿户；一个是非农产业的乡镇企业是2200个，两个“2.2”。这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也可以说是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主体。因为12.5亿人口，9亿是农村人口；而农业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决定我们未来中国经济的最主要的力量。不仅是对农业，对农村，而且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这是第二。